

我国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制度史论

孙 骥¹ 孙金荣²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2. 山东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传统农业时期的“禁杀牛”不仅是一项农业制度,也是基于整体主义视角的长期性国家治理方略。通过制度史梳理可以发现,“禁杀牛”最早起源于周礼,并随国家治理的需要不断发展。演进中,“禁杀牛”制度经历了孕育、形成、强化、完善、成熟五个历史阶段。纵观整个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制度具有礼法合一性、连贯完整性、普遍入罪性、伦理变通性等特征。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禁杀牛”具有多重价值。农业经济层面,“禁杀牛”有利于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保护,推动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视阈下,“禁杀牛”对维护等级与宗法制度、稳定社会治安、巩固边疆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禁杀牛;传统农业时期;制度史论;农耕文明;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2-0016-10

Discussion of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System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eriod

SUN Ji¹ SUN Jin-ro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eriod is not only an agricultural system, but also a long-term national governance strategy based on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originated in Zhou Li at the earliest and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with the nee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evolution,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has gone through five historical stages: gestation, formation, strengthening, perfection, and maturity. Throughout the entir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eriod,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etiquette and law,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universal criminality, and ethical flexibility. As an important system,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has multiple values. A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ans and the promotion of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ban on cattle killing" is of great value in maintaining the hierarchy and patriarchal system, stabilizing social order, and consolidating frontiers.

Key words: ban on cattle kill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eriod; institutional history; agrarian civi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2-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态环境司法禁令制度的基本原理与程序实施研究”(21BFX143);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开发利用研究”(16BZWJ02);山东省科协项目“农业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理论与实践”(鲁科协办发[2017]39号)

[作者简介] 孙骥(1990-),男,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农业法;孙金荣(1963-),男,文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史、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

引言

我国漫长的传统农业时期,牛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受到长期保护。传统农业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耕牛保护的理念,并在仪礼、祭祀、礼法、典章制度、社会行为规范、传统习俗中加以规定。围绕耕牛保护的目标,“禁杀牛”制度以规范性内容对杀牛行为做出了禁止性、惩罚性规定,对各阶层人员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拘束效力。对传统农业时期的“禁杀牛”制度史进行全面梳理与归纳,不仅有利于研究传统农业时期的农业政策,也有助于挖掘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国家治理措施及指导思想。因而,研究传统农业时期的“禁杀牛”制度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基于农业经济的耕牛保护”议题进行思想史与制度史探讨^①。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个逻辑关系仍待明确:牛作为我国古代的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禁杀牛”制度与“基于耕牛保护的禁杀”制度是否完全等同?即在耕牛保护目的之外,“禁杀牛”制度是否还有其他价值?为此,有必要从历史文献出发,对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制度史进行全面梳理,探求“禁杀牛”制度的演进规律和制度特征。进而,全面探讨“禁杀牛”制度在传统农业时期的成因与制度价值。

一、“禁杀牛”制度演进的历史阶段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整个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制度经历了孕育、形成、强化、完善、成熟五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先秦礼制下的“禁杀牛”雏形

先秦时期,以规范各级贵族等级秩序的礼制孕育了我国古代“禁杀牛”制度的原始雏形。从现有史料中可以发现,最晚至西周时期,礼制倡导下的“禁杀牛”就已经出现雏形。这一时期,“禁杀牛”作为礼制的组成部分,用以约束、规范各等级社会成员的行为。具体而言,“禁杀牛”制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禁杀牛”规范各阶层社会成员的饮食秩序。《周礼·膳夫》中规定:“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②《礼记集说》:“按《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谓大牢也。是周公制礼,天子日食大牢,则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③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根据周朝礼制规定,天子食用太牢,牛、羊、猪在列;诸侯平时食用羊,朔月(每月初一)才能食用牛;大夫平时食用猪、犬,朔月才能食用羊。这一记载是先秦礼制对动物禁杀制度的代表性规定。根据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的饮食不受限制,其他各级贵族食用牛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依照周礼形成的饮食秩序,贵族食用牛必须符合特定的时间要求。《国语·楚语下》中也记载了类似的饮食礼制:“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第二,以“禁杀牛”完善祭祀制度。《礼记·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④在《皇王大纪·三王纪·康

① 代表性成果有,刘兴林:《牛耕起源和早期的牛耕》,《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赵晓华:《清代救灾期间的耕牛保护制度》,《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魏殿金:《中国古代耕牛保护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魏一鸣、杨乙丹:《律法与业报——宋代耕牛保护体系研究》,《西部学刊》2022年第12期;熊帝兵:《清前期的盗宰耕牛之风及治理——以陈宏谋执政期间的江西、湖南、江苏为中心》,《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膳夫》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660页。

③ 《四库全书》,经部,礼记之属,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7册第646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卷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7页。陈戌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96页。

王》中有相同的记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荐于寝，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庶人无故不食珍。”^①自西周至春秋时期，按照礼制，只有天子以牺牛行祭祀大礼。其他各级贵族，皆不得在祭祀中使用牛，否则即是违反周礼的规定。

第三，以“禁杀牛”体现仁道，敬畏自然，崇尚天人和合。前述《礼记·王制》规定的“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祭祀制度，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另外《皇王大纪·三王纪》：“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②这些规定虽然是从祭祀引发出来的，但可以看出，将“杀生”视为贵族应当远离的行为，一方面因为杀牛行为与周礼不相容，另一方面也在彰显着以仁道之术面对自然万物。提倡遵循天时、崇尚自然，杀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其中，杀牛行为应当受到最严格的限制。

第四，在春秋中后期及战国初期，“禁杀牛”部分地与牛耕发生关联。周文王既躬耕陇亩，也放牧牛羊，已见牛耕。春秋时期金属农具与非金属农具并存，战国时期铁农具发展。《国语·齐语》：“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铚，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管子·轻重乙》：“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铤、一镰、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为农。”已见铁农具主要有：犁、铲、耨、锄、铤、铎、斧、镰、铎等。牛耕初见成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牛与耕或犁密切联系，表明牛耕已确实存在。为什么祭祀减少用牛？因为牛与铁犁作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已被认知。《国语·晋语九》“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明确说明原作宗庙牺牲的牛被用于农田耕作了。

先秦时期的“禁杀牛”主要体现为礼制下的倡导性规定，尚未形成严格规范意义上的“禁杀牛”制度。“禁杀牛”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各级贵族的日常行为符合周礼的规定。在礼制中，牛与同属六畜的羊、狗、猪等同属被限杀之列，因牛的饲养与繁殖成本更高，故受到的限制最多。在时间节点上，牛耕生产方式直到春秋时期才产生。因此，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周礼中的“禁杀牛”并非源于对耕牛的保护，而且出于维护等级秩序的需要。同时，由于“禁杀牛”的倡导性特征，最高统治者并没有明确规定杀牛行为的惩罚性后果。因此，基于礼制的“禁杀牛”是一种柔性的道德伦理约束，而非刚性的惩罚制度约束。

（二）形成阶段——“礼崩乐坏”与“禁杀牛”的法制转型

进入封建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国家治理手段从礼制转向法制。在这一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禁杀牛”制度开始形成。从秦代到西汉，以惩治盗抢犯罪为目的的刑律开始成为“禁杀牛”制度的主要载体。由于牛、马的价值性高于一般牲畜，盗抢犯罪中的杀伤牛马行为被秦律单独列出，成为秦代“禁杀牛”制度的主要文献来源。《秦简·秦律杂抄·牛羊课》中规定：“诸马牛到所，毋敢穿阱及置它，敢置阱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者，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③根据该文献的记载，杀牛的处罚与盗牛等同。而根据《桓宽《盐铁论卷十·刑德第五十五》》规定，“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盗牛行为的处罚措施为“枷刑”。由于“杀伤马牛，与盗同法”，因而秦代对杀牛的处罚也是“枷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盗抢类犯罪是秦律的重点惩治行为，其中与盗抢有关的杀牛行为也被秦律单独予以规定。进入汉代，律法承秦制，继续对盗抢类犯罪中的杀牛行为进行严惩。根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贼律》的记载：“船人渡人而流杀人，耐之；船啬夫、吏主者赎耐。其杀马牛及伤人，船人赎耐，船啬夫、吏赎千（迁）。”^④该条规定将杀牛定为犯罪，并与伤人行为一同论处。《张家山汉墓竹简·田律》规定：“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穿。穿穿

① 《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皇王大纪 卷二十七，[宋]胡宏：三王纪，康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3册第255页。

② 《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皇王大纪 卷二十三，第313册第224页。

③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贼律》，张家山汉墓竹简第6号简，出土号为F4，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及置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杀人,(251号简)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252号简)”^①从这则张家山西汉初年古墓出土的竹简法律条文可见,西汉初年对伤害马、牛的处罚规定,与秦律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秦至西汉时期,律法中虽已对耕牛保护做出规定,但相关条文数量不多,且律法的关注点是耕牛的“精养”而非“禁杀”。《淮南子·主术训》曾经对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论述:“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跲耒而耕,不过十亩。”可见,在西汉初年“跲耒而耕”还是一种重要的耕作方式,牛耕生产方式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秦代律法中,明确规定了铁质农具的保护与使用,耕牛的蓄养、管理等制度,并对养牛不力的个人及监督不力的官员进行处罚。具体制度设计中,秦律尚未直接以保护牛耕为目的出台“禁杀牛”制度。进入西汉初期,为尽快恢复农业经济,加之铁犁牛耕、精耕细作的现实需求,保护耕牛十分必要。通过汉承秦制,西汉也对耕牛的饲养与管理进行了规定。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秦与西汉都以律法的形式规定了“禁杀牛”制度。与此相对应,“禁杀牛”的制度载体从礼制转向法制。从制度功能的视角分析,这一时期的“禁杀牛”制度侧重于惩治盗抢犯罪,尚未演化出基于耕牛保护的专门性“禁杀牛”制度。

(三)强化阶段——政权更迭与“禁杀牛”制度的空前发展

从东汉至魏晋,是“禁杀牛”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进入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保护农业生产以增加人口和国力成为统治者的重要施政方略。为此,推广牛耕生产方式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政策,也为“禁杀牛”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的“禁杀牛”制度呈现几点变化。

第一,“禁杀牛”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确认,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施行。朱翌《猗觉寮杂记》明确记载,州郡禁止杀牛始于东汉,朝廷禁止杀牛始于晋。《猗觉寮杂记》:“第五伦守会稽,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州郡禁屠牛始于此。晋元帝时,丁泽书云:杀牛有禁买者,不得辄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②《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第五伦“拜会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③第五伦上任会稽太守,向所属各县发出文书告知百姓,如果有胡乱杀牛的人,官吏就给予处罚。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全面意义上的“禁杀牛”制度最早从州郡开始,进而推广到全国,呈现出从地方到中央的推广趋势。与秦至西汉时期主要对盗抢犯罪中的杀牛行为进行惩罚不同,东汉至晋朝开始全面推行“禁杀牛”制度。

第二,惩罚措施空前严厉,出现了大量对杀牛行为处以极刑的规定。《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载:“太祖辟矫为司空掾属,除相令,征南长史,彭城、乐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矫曰:‘此孝子也。’表赦之。迁魏郡太守。”^④太祖征召陈矫担任魏郡司空掾属,历任相县令,征南将军长史,彭城太守,乐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有一男子的父亲病了,该男子就杀牛为父亲祈祷福寿,根据当时保护耕牛的法令,县官判他抛尸街头的死罪。陈矫认为,该男子的行为虽违反刑律但符合孝悌之义,因而上表请求赦免了他。从这段记载可以判断,三国曹魏时期百姓随意杀牛应当判处死罪。

第三,“禁杀牛”制度被少数民族政权广泛沿用。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延兴五年(475)“夏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六月庚午,禁杀牛马。”^⑤熙平元年(516)魏孝明帝元诩“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禁。”^⑥匈奴贵族建立的汉赵政权也颁布了“禁杀牛”制度。根据史书记载,汉赵皇帝刘曜颁布了“禁杀牛”制度。“曜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田律》,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51、252号简,第167页。

②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第850册第483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二十五史》(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029页。

④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二·陈矫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643页。

⑤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二十五史》(卷一),第432页。

⑥ [唐]李延寿:《北史》卷四,魏本纪第四,《二十五史》(卷五),第441页。

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①严令除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杀牛者判死罪。

第四,“禁杀牛”强化了对人日常行为的约束。《梁书·傅昭传》载:“昭所莅官……性尤笃慎。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②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朝梁时期不仅杀牛行为获罪,食用他人杀的牛也会获罪。足见为保护耕牛,朝廷律令之严格。根据《梁书·谢朓传》的记载,谢朓之子“援,官至司徒右长史,坐杀牛免官,卒于家。”^③《南史·谢朓传》亦载朓之子“援,位司徒右长史,坐杀牛废黜。”从上述记载可以发现,朝廷官员违反“禁杀牛”规定的,还会被免官。

第五,“禁杀牛”伴随着移风易俗。《南史·萧琛传》记载:萧琛“为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厅事安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軋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履登厅事,闻室中有叱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事,何也?’因迁之于庙。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④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杀牛”制度得到了全面发展,制度的适用范围、惩罚力度等都有了强化。

(四)完善阶段——法制发展与“禁杀牛”条款的精细化

唐宋金元时期,“禁杀牛”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这一时期,统治者继续以推广牛耕促进农业发展为基本国策,以耕牛保护为目的的“禁杀牛”制度继续受到重视。同时,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律法的重要发展时期,律法的日益完善也为“禁杀牛”条款的精细化提供了重要保障。唐代开国之初,唐高祖李渊颁布《断屠诏》,通过重申周礼的规定,对“禁杀牛”制度予以明确。根据《断屠诏》的规定:“《礼》曰:‘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赡。”唐高祖直接以诏书形式禁杀马、牛,而后禁止屠杀耕牛,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唐代的一贯国策。

唐代对“禁杀牛”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唐律·厩库》中。一方面,细化了对盗抢犯罪中杀牛行为的处罚规定。《唐律·厩库》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赃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价不减者,笞三十。见血跪跌即为伤。若伤重五日内致死者,从杀罪。”^⑤[疏]议曰:“官私马牛,为用处重;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⑥充分认识到牛是耕作的根本,马在交通运输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杀牛马要判一年半发配流放及服劳役等罪。又[疏]伤牛马见血,不限伤处多少,只要见血即判刑。牛马蹄、胫跌伤,骨节差跌伤,即使不见血,也按伤量刑。如果伤得重,五日内致牛马死亡,也按杀牛马论罪。牛马主人自杀马牛也要服一年流放劳役罪刑。《唐律·厩库》:“诸杀缌麻以上亲马牛者,与主自杀同;杀余畜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各偿其减价。”^⑦内外有近亲关系的人,相互杀马牛,所获罪刑与主家自杀牛马相同,共同获流放、劳役等罪一年。《唐律·厩库》:“诸犬自杀伤他人畜产者,犬主偿其减价;余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即故放令杀伤他人畜产者,各以故杀伤论。”^⑧如果故

①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三,载记第三,刘曜,《二十五史》(卷二),第977页。

②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二十,傅昭传,《二十五史》(卷三),第808页。

③ [唐]姚思廉:《梁书》卷十五,列传第九,谢朓传,《二十五史》(卷三),第781页。

④ [唐]李延寿:《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萧琛传,《二十五史》(卷五),第100页。

⑤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厩库,凡二十八条,“故杀官私牛马”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令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192页。

⑥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厩库,凡二十八条,“故杀官私牛马”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令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193页。

⑦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厩库,凡二十八条,“杀缌麻亲马牛”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令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194页。

⑧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厩库,凡二十八条,“犬伤杀畜产”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令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194页。

意放狗杀伤牛马,与“故杀官私马牛者”同罪。另一方面,对祭祀领域的“禁杀牛”规定予以细化。唐代“禁杀牛”制度的显著特点是,以皇帝敕令形式严格执行在祭祀领域的耕牛替代制度。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春正月甲戌,“敕两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以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以诸畜代。”^①大中五年春正月甲戌,朔日,初一,宣宗下诏书,命令两京及天下州府,自大中五年正月一日起,三年内不得杀牛。如果郊外祭天或太庙祭祀需要用牛,就用其它各类牲畜代替。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敕:畿甸及天下州,应屠宰牛犊,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后,三年内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断。如郊庙飨祀,合用牛犊者,即以诸畜代之。其年五月敕:寿昌节,天下不得屠杀。”^②唐宣宗大中五年下诏令,自大中五年正月一日起,此后三年内绝对禁止屠杀牛。如大型宗庙社稷之祭祀活动,应当用牺牛祭祀,就用其它各类牲畜代替。大中五年五月又下诏令:寿昌节全国不得屠杀耕牛。由此可见,唐代对祭祀领域的“禁杀牛”进行了较多规定。此后,祭祀领域的“禁杀牛”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成为“禁杀牛”制度适用的又一重要领域。

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时期对“禁杀牛”制度予以了进一步细化。其中,后唐时期的规定具有代表性。后唐王朝建立后,对耕牛的保护高度重视,对“禁杀牛”制度的规定明显较唐朝更为严格。“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十一日敕下:‘凡军人、百姓将牛驴及马宰杀货卖,今后切要断除。如敢故违,即擒捉,不问职分高低,所在处斩讞奏。其本军指挥使,若不切铃辖,致军内有人违犯,别处捉获,亦当取断。’”^③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诏令可以看出,故意将牛、驴、马宰杀卖货的人,不问职分高低,一律于所在之地问斩后再上奏。军中官吏,若不切实加以节制管辖,致使军中有人违犯,同样治罪。此后,后唐明宗对严格的“禁杀牛”措施进一步予以明确。《旧五代史·明宗纪四》云:天成二年(927)三月“丁卯,诏:‘所在府县纠察杀牛卖肉,犯者准条科断。其自死牛即许货卖,肉斤不得过五钱,乡村民家死牛,但报本村所由,准例输皮入官。’”^④始终严令“禁杀牛”,亦是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出发。足见后唐明宗李嗣源对耕牛、农业的高度重视。历代给予高度评价。

进入宋代,刑律对杀牛的行为与后果进行了细化。宋代对宰杀“官牛”和“私牛”的行为进行了差异化的规定。《宋刑统》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若伤重五日内致死者从杀罪……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⑤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颁布《宋刑统》严令禁止屠杀和残损官私牛马。司法量刑,较多借鉴了唐代法律制度。杀官私牛马要判一年半发配流放及服劳役等罪。牛马主人自杀马牛也要服一年流放劳役罪刑。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北宋前期官营畜牧业迅速发展。在刑罚措施的选择方面,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百姓杀牛通常被判发配流放之罪。根据史书记载,“初,民饥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死之命,与盗杀者异,若不禁之,又将废穡事。今岁少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⑥从该记载可以看出,张逸上奏仁宗皇帝,将灾荒饥饿中百姓杀牛活命与盗杀耕牛的行为区别对待,将饥饿中杀牛活命的百姓从发配流放地召回,恢复其农业生产。犯杀牛罪发配与放还复其业,皆是从有利于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需要出发。

金朝与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在“禁杀牛”制度方面延续了先前王朝的制度。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四月丙午,诏曰:‘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其令禁之。’”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十月丁亥,辛丑,“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着为令。丙午,大享于太庙。”^⑦元世祖三年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八,本纪第十八下,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六二八页。

②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断屠钓”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第606册第544页。

③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九,《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第607册第530页。

④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八,唐书十四,明宗纪四,中华书局,1976,第521页。

⑤ [五代·北宋]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卷十五,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循吏,张逸传,《二十五史》(卷十),第2291页。

⑦ [元]脱脱等:《金史》卷六,本纪第六,世宗上,《二十五史》(卷八),第917页。

(1266)十二月规定,“丙寅,申严屠杀牛马之禁。”^①

通过对唐、宋、金、元各朝代“禁杀牛”制度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随着律法的日趋完备,这一时期的“禁杀牛”制度更为精细化,对不同情形进行了差异化的规定。同时,在惩罚措施方面,除了后唐政权继续采用极刑外,其他朝代主要采取流放、劳役等刑罚。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出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禁杀牛”的惩罚力度已经有所减轻。

(五)成熟阶段——制度沿袭与“禁杀牛”的功能延伸

明清时期,“禁杀牛”制度逐渐成熟。这一阶段,“禁杀牛”制度主要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借鉴先前各朝刑律的基础上,对盗抢犯罪中杀牛行为的刑罚制度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明会典》确切记载,《大明律·刑律》明文规定:“若盗马牛而杀者,杖一百、徒三年。”^②如果偷盗并且屠杀牛马,受杖刑一百,拘禁服劳役三年。由此观之,大明刑律对于盗杀牛马刑罚比唐宋时期要重。对于非盗而故意杀死他人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的,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明朝对不同类型的杀牛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量刑标准。在刑罚的严厉程度上,《大明律》对杀牛行为的惩罚与唐宋基本相近。清朝时期,“禁杀牛”制度主要体现在两类规范中:一类是以惩治刑事犯罪为目的的《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另一类是以管理军务为目的的《大清律例·兵律·厩牧》。清代禁杀牛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对抢、盗行为的刑罚。《大清律例·刑律·贼盗》规定:“若盗马牛[兼官私言]而杀者[不计赃即]杖一百,徒三年。驴骡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计赃[并从已杀计赃]重于[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盗[窃盗常人盗]罪一等。”^③对盗杀马牛制定了明确的量刑。《大清律例·兵律·厩牧》“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若计只重于本罪者,照盗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犯发附近充军。杀自己牛者,枷号一个月,杖八十。”^④规定所有宰杀耕牛、私自开圈店或是贩卖耕牛的人都要受到一定的刑罚。第一次犯法的人,戴枷两个月,杖刑一百;再犯,发配到附近充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⑤即使杀的是自己的耕牛,也会按照盗窃耕牛的罪行来判。如果宰杀别人的耕牛,那受到的刑罚就更重了。可见,明清时期对与盗抢行为相关的“禁杀牛”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第二,以食用为目的的杀牛行为仍然被统治者所禁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四回写道,汤知县招待举人范进,席上有燕窝、鸡、鸭,知县说:“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也都不得吃。”通过该描述可以发现,根据朝廷的规定,杀牛行为仍然被禁止,各级官吏仍然要严格执行。

第三,“禁杀牛”制度与军事屯垦行为发生联系。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边疆地区的开垦日益普遍。特别是进入清朝,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军事屯垦活动显著增多。与先前朝代显著不同,清朝时期“禁杀牛”制度开始在《大清律例·兵律》中大量出现。在《兵律》中规定“禁杀牛”制度,并将“禁杀牛”适用于边疆地区,显示出清朝统治者认识到牛耕生产方式在边疆军事屯垦中的重要意义。清代对违反“禁杀牛”的惩罚措施选择上,较多采用“发配充军”,体现了这一时期边疆开发对耕牛和劳动力的需求。此外,清朝还对杀牛后的走私行为专门作出了规定。根据《大清律例·兵律·关律》的记载,牛角作为军需违禁物资禁止私自外卖,对杀牛并向边关外贩卖牛角的行为,为首者会被判处死刑但不立即执行,先监禁等候秋审或朝审复核审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相较于一般的杀牛行为,清朝对边关军事管理中杀牛并走私牛制品的处罚明显更为严厉。

① [明]宋濂、王祚等:《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二十五史》(卷十一),第17页。

② 《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第618册第320-321页。《大明律》,卷十八,刑律,“盗马牛畜产”条,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③ 《大清律例》卷二十四,刑律,贼盗中之三“盗马牛畜产”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740页。

④ 《大清律例》卷二十一,兵律,厩牧,条例,《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690页。

⑤ 《大清律例》卷二十一,兵律,厩牧,“宰杀马牛”条,《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第672册第689页。

二、“禁杀牛”制度的特征分析

通过对古代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禁杀牛”制度在漫长的传统农业时期不断演化。虽然各个朝代的生产力水平与国家治理任务不同,但“禁杀牛”仍然显示出一些制度共性。

(一)礼法合一性

传统农耕时期的“禁杀牛”制度,体现了较为明显的礼法合一特征。一方面,“禁杀牛”的演进中,礼制与法制都是“禁杀牛”的制度实现形式。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禁杀牛”的制度载体是礼制。而随着“礼崩乐坏”,到秦汉时期法制已经成为“禁杀牛”的主要实现形式。“禁杀牛”法制的不断完善过程中,礼制并没有完全退出。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禁杀牛”法制的制定沿袭了礼制的等级与宗法秩序,有的制度还会直接引用礼制作为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礼制与法制在对“禁杀牛”制度的落实中功能互补。礼制强化社会成员对等级秩序、宗法秩序的共识性认识,对因祭祀等原因的杀牛行为进行限制;法制对违反“禁杀牛”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以否定性评价直接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对盗抢杀牛、食用杀牛等行为做出了限制。通过礼法的结合,共同构筑了体系化的“禁杀牛”制度体系。

(二)连贯完整性

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制度与国家治理制度,“禁杀牛”制度在漫长的传统农业时期显示出连贯完整性的特征。从时间上,“禁杀牛”制度与我国传统农业时期的生产方式相伴而生。从先秦时期直到清代,在整个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被历代统治者采用,有的最高统治者甚至直接发布“禁杀牛”的诏令。“禁杀牛”制度的连贯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延续性,还体现在“禁杀牛”制度被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所采纳并严格执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元朝,入主中原后为适应农耕生产方式的需要,都对“禁杀牛”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因而,“禁杀牛”制度显示出政策的延续性。

(三)普遍入罪性

纵观整个传统农业时期,各朝代在对杀牛行为的惩罚措施设计中,普遍作出了入罪性规定。先秦时期,杀牛行为要在礼制框架下作为“违制”行为受到制裁。自秦代开始,开始以法制的形式对杀牛行为进行刑事制裁。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各朝代对杀牛行为进行入罪性规定后,对应的刑法种类主要有死刑、流刑、枷刑、徒刑、杖刑。根据各朝代制度规定的不同以及行为情节的不同,运用多样化的方式惩治杀牛行为。而在对杀牛行为普遍入罪的前提下,各朝代刑罚的严厉性存在差异。针对杀牛行为,有的朝代杀牛是重罪,杀牛者要被判处极刑,有的朝代杀牛食用者仅判处杖刑或徒刑。通过对“禁杀牛”制度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该制度的宽严差异性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统治时局两个因素。从生产力的情况来看,“禁杀牛”制度整体呈现“前紧后松”的特征。

牛耕生产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虽已出现,但并未得到推广。从秦汉开始,“禁杀牛”制度开始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魏晋南北朝,牛耕生产方式得到较快推广,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显著提升。因而,这一时期的政权对“禁杀牛”的规定更为严格。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多部律法中出现了对杀牛者处以死刑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我国传统农业时期对“禁杀牛”规定最严格的时期。而进入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土地开垦面积的扩大,“禁杀牛”的严厉程度开始逐渐宽松。杀牛行为虽然仍被禁止,但处罚措施多为徒刑或杖刑,已经基本不再直接处以严厉的死刑。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以食用为目的的杀牛行为虽然仍被禁止,但在刑律中的规定已经较为少见。“禁杀牛”制度的严厉程度,还受到统治时期时局的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相比于大一统时期,战乱割据时期的统治者更有可能通过律法制定严格的“禁杀牛”规定。通过对“禁杀牛”制度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对杀牛行为惩罚最严厉的阶段是魏晋

南北朝时期,其次是五代十国时期。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杀牛行为处以死刑的规定较为普遍,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政权对杀牛行为处以死刑的规定明显严于唐、宋两个朝代。战乱割据时期,农业生产、人口增长能够为政权的延续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因而牛耕生产方式会受到统治者更严格的保护。相比较而言,大一统王朝对杀牛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

(四)伦理变通性

“禁杀牛”作为一项普遍的管理制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予以明确。但在执行中,对杀牛行为的惩罚并非完全按照律法的规定执行。实践中,统治者会将惩罚措施与传统道德伦理相结合,以期通过惩罚措施获得最有效的伦理教化效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两种状态下的杀牛行为会得到变通处理。

第一,符合孝悌之义的杀牛行为被宽恕。与传统农业时期安土重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以孝道为宗旨的家庭伦理观被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因而,在“禁杀牛”制度的执行中,基于孝道动机的杀牛行为与一般的杀牛行为区分开来。因孝道而杀牛,通常会被免除处罚。在对杀牛行为处罚最为严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孝道的杀牛行为仍然会被免罪。通过对符合孝悌之意的杀牛行为免除处罚,有利于统治者弘扬“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实现法与情的统一。

第二,生存危机下的杀牛行为被容忍。“禁杀牛”制度实施中,饥民在情况危急下杀牛,可以免于处罚。对饥民杀牛进行例外性规定,也是统治者进行利益衡量的考虑。一方面,在饥荒状态下,将饥民的生命价值放在牛之前,有利于体现统治者“以人为本”“民为重”的统治理念。另一方面,在处罚措施的可执行性层面,饥民杀牛后可能继续逃荒,各级官吏在事后难以对杀牛者进行调查,因而无法追究杀牛者的责任。

将“禁杀牛”制度与传统伦理道德相结合,并对违反“禁杀牛”但符合伦理教化的行为进行变通执行,体现了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对“法治”与“德治”的并重。因而,统治者在“禁杀牛”制度的执行中,一方面追求直接的制度效果,另一方面还通过优化执行方式获得间接的教化效果。

三、“禁杀牛”制度的价值分析

“禁杀牛”制度是一种基于整体主义视角的长期性国家治理措施,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作为一项农业制度,“禁杀牛”有利于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保护。在更广泛层面,“禁杀牛”对维护等级与宗法制度、稳定社会治安、巩固边疆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层面——“禁杀牛”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保护

“禁杀牛”制度的首要功能是保护农业生产资料。在我国整个传统农业阶段,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匹配的问题始终存在:广大无地或少地农民有劳动力但缺少农业生产资料,需要与地主、富裕自耕农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禁杀牛”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实现最大限度地挖掘农业生产潜能(见表1)。

表1		两种耕牛管理模式对比		
模式	行为动机	耕牛用途	生产力变化	政策效果
放任模式	自利性	消费	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降低	1.耕牛所有者生产资料减少 2.无地少地农民粮食不足 3.国家钱粮收入减少
禁杀牛模式	他律性	持续再生产	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规模扩大	1.耕牛所有者增收 2.无地少地农民粮食有保障 3.国家钱粮收入增长

在对耕牛使用不进行管理的放任模式中,地主与富裕自耕农等对耕牛的使用将完全按照自利性动机进行。由于古代肉类的稀缺,地主与富裕自耕农在解决自身粮食需求的前提下,基于自我满足的需要

可能将牛用于消费。进而,造成耕地面积减少与粮食产量降低,影响对无地少地农民的粮食供给,导致国家钱粮收入的减少。为此,统治者必须制定措施,保证耕牛这类农业生产资料被投入持续再生产而非消费领域,以充分挖掘农业生产潜能。“禁杀牛”制度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护耕牛,对杀牛行为进行惩治,是一种他律性的管理方式。通过国家律法对耕牛管理活动进行约束,使得耕牛能够持续投入再生产。在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显著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实现了国家、耕牛所有者、无地少地农民的三方共赢:地主、富裕自耕农等耕牛所有者获得更多农业收益;劳动力与耕牛的结合,为缺少生产资料的无地少地农民提供了谋生机会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进而,农业产量的提高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稳定国家统治的重要基础。

(二)“禁杀牛”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延伸

第一,维护了等级与宗法秩序。“禁杀牛”并非一项孤立制度,而是与维护等级秩序、宗法秩序的国家目标高度绑定。“禁杀牛”制度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主要表现在先秦时期。礼制通过对天子、诸侯、百姓等在食用牛肉方面进行差异化的规定,将食用牛肉作为天子的特权,以此规范各级社会成员的行为,对西周时期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宗法秩序也是“禁杀牛”制度的重要价值指向。特别是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禁杀牛”制度在律法中的体现日益增多,各类原因的杀牛行为几乎都被严厉禁止。然而,因祭祀导致的杀牛行为在诸多朝代中成为唯一的例外性规定。直到唐代,对祭祀杀牛的豁免才逐渐被取消。将祭祀原因的杀牛进行单独豁免,凸显了对家族宗法制度的重视。从“禁杀牛”制度与等级秩序、宗法秩序之间的高度渗透可以发现,“禁杀牛”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捍卫统治秩序的政策工具。

第二,惩治犯罪与维护治安。“禁杀牛”所具有的“刑事法律制度”功能,对惩治犯罪与维护治安具有重要价值。耕牛作为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具有不同于一般牲畜的重要意义。从秦代开始,“禁杀牛”制度开始出现在惩治盗抢类犯罪的刑律中。此后,涉及牛的犯罪行为一直被各朝代律法予以重点关注,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对不同犯罪情形下的杀牛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处罚规定。因而,“禁杀牛”已经成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制度,发挥了惩治犯罪与维护治安的功能。同时,“禁杀牛”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也丰富和完善了古代刑律,使得刑律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色彩,充实了中华古代法律文化的内涵。

第三,保障边疆开发与军事屯垦。“禁杀牛”制度的实施,是对边疆开发与军事屯垦的重要保障。由于边疆农业生产条件的有限性,长期以来对边疆地区的戍守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支出方向。到了明清时期,“禁杀牛”制度被广泛适用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军事屯垦。将“禁杀牛”制度从黄河、长江流域的传统农业区向边疆地区推进,有利于强化边疆地区的农业经济基础,使得边疆地区的经济基础由“内地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型。而农业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对保持边疆稳定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从更长远的视角进行分析,我国当代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也受益于古代“禁杀牛”制度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结 语

在整个传统农业时期,“禁杀牛”不仅是一种农业制度,也是整体主义视角下的一项长期性国家策略。无论在礼制抑或法制中,“禁杀牛”都与该时期的整体国家决策高度绑定,发挥了维护国家统治的政策工具价值。“禁杀牛”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在维护等级与宗法制度、稳定社会治安、巩固边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漫长的制度演化中,“禁杀牛”逐渐成为一项具有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特征的国家制度,并最终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多重助益。

(责任编辑:徐定懿)